

# 沈从文说《长河》

唐吉慧

我在小学时极为顽皮，上课总忍不住要和四周的邻座咬耳朵说悄悄话，年轻的女老师见了便瞪大眼睛冲我喊一声：“电风扇，又开始转了！”女老师是教语文的，二十岁不到师范学院刚毕业，高高的个头爱打扮，一头飘逸的长发披在肩上，衬得纤秀的脸粉的好看极了，像钱慧安笔下的淡彩仕女，偶尔缩起发髻笑起来的样子又像《罗马假日》里的奥黛丽·赫本，甜得要命。偏偏我的语文成绩差，受不了挨她的罚，几次她抹着粉笔灰的细手把我的耳朵拉得红红的，弄得同学们笑我“粉条叉烧”。我不甘心，有回在作业本上把她画成了动画片里捉了葫芦兄弟的“蛇妖”。从此上课铃响，当她夹着书本站在讲台前叫一声“上课！”我就默念，蛇妖出山，天下必遭大乱，只待“七位好汉”来受难了。

到了中学我仍然没有好好念书，上课看武侠小说，逃课去城隍庙吃小笼包，请同学帮忙做作业，所幸胆子小，到底没给老师惹是非添过乱子。我只是烦，烦数理化、烦外语、烦政治，考试更烦，好在学校里有间图书室，每能在架子上找到几本有趣的书。我正是在这时候阅读沈从文的，他的《边城》、他的散文集，朴素的文字里那些湘西的神秘景象深深吸引了我这个尚未见过世面的中学生。沈先生的父亲爱听京剧，希望儿时的沈先生能学戏，作一个谭鑫培，却意外发现沈文是个学会了逃学、说谎，在太阳底下四处游荡的“小流氓”，这伤透了沈先生的父亲、一个军人的心。而沈先生最终成为大作家，这使我觉得了一位隔代知己，因而有了与许多同学不同的想法，读书好坏或与将来并没有多少联系，“当我学会了用我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沈从文说。

出于对沈先生的敬仰，这十多年来我对他的字同样格外喜爱。沈先生15岁时跟着亲戚进了一支土著部队，由于“可以写几个字”做了名“司书”，写一角公文、誊一份报告，每月四块钱的薪水，吃喝省下的零星藏在裤袜或鞋底里，五个月内居然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正式从军了，别人的墙上挂着大枪小枪，他的房间却贴满自己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落，还贴着字条：“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他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是钟繇王羲之，活着的是曾照李瑞清，他立了雄心要超过他们。近期读到他的《一封长信，1981年12月18日写给湖北武汉大学（今湖北大学）从事文学研究的李恺玲，黄豆大的毛笔字密密麻麻满四页八行笺，字字干净利落，某些笔画带着草书隶书的笔意，显得既优雅又隽朴，信的内容则大多围绕他的小说《长河》。

那年湖北的《长江》文学丛刊计划重印《长河》，沈先生之前读过李恺玲的文章，不仅沈先生，他的夫人张兆和也觉得李恺玲的笔下有分寸，且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所以他邀请李恺玲为重印的《长河》写篇小文章。沈先生在信里说这部“命运多舛”的小书：

四十多年前，分别在昆明、重庆、香港报刊发表时，就因触犯时忌，一再被删改，到集稿送交桂林开明书店付印时，写的题词中就预感到，此后恐有一天会“付之一炬”。一送桂林，不出所料，就被当时主持图书审查处扣留，直到抗战结束，才亏得在重庆中山文化馆工作的老友左恭为交涉发回，由迂回上海的开明付印，属拟印三十本选集第十种。时已迫近解放，只印一版，到五三年初后，得书店通知，“所有业已印行或未印行各籍，均已过时，全部代为销毁，纸型亦不例外”。

信中提到的“图书审查处”，是1934年国民党成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持工作是潘公展。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有一回在课堂上骂国民党中宣部无能而滥用职权，为此讲台下坐着的三青团学生打了他的小报告，以致《长河》第一卷原稿被不断删减，送桂林后即被扣下，待左恭托了重庆政治学校的好友高植想办法取回时已“面目全非”。因时间过去多年，他的记忆无法一一恢复原状了，许多内容上不能衔接之处也就无法再做补充，最初要写三卷的打算，因1953年书稿的毁去，剩下的两卷到底就此搁了笔。

1950年至1978年，沈先生离开了熟悉的文学界，调入新成立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研究员。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工作时间长达11个小时，就这样不问文学，春夏秋冬兜兜转转在了文物库房之中，那段日子倒让他觉得：

在人为风风雨雨中，把新学的种种常识为人民服务的，既不是非，日子也过得比较安静，不仅从未灰心丧气，反

# 续旧缘 忆故人

江青



左图：江青与启木（左）、Angie 2022年11月11日摄于张大千画前。右图：启木与父母——俞大纲、俞邓敬行，背景为曾国藩手书的对联。更多图文请移步“文汇”App和“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

“有缘千里来相会”是耳熟能详近乎口头禅的一句话，却在近日体会到了那份难能可贵的真情和难舍离缘的缘分。

缘起是良师益友俞大纲教授的女儿俞启木（Ruby）在整半世纪后跟我联系上了。当我们通电话时才发现我们是隔河之邻——哈德逊一河之隔，她在新泽西那头，我在曼哈顿这边，没多久她跨河而来。在我们相拥的那一刻，竟然感到我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记忆如滔滔洪水将我们淹没，我们滔滔不绝地谈我口中的俞伯伯、俞伯母、启木的父母，她一直感到未能尽孝无比愧疚；也谈我尊敬的长者俞大维先生、她的四伯伯，笑谈这位智勇双全的前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生平只怕一个人——老婆，也是他的表姐陈新午（陈寅恪妹妹），我亲眼见她发难威时，对方一点火气全无，永远腼腆一笑带过；还有我印象中刀子口豆腐心的傅妈妈（知名学者俞大维，台大校长傅斯年夫人），启木的八姑。我们也谈到她家中像亲人一样贴心的老保姆，大家口中的施妈。施妈从大陆跟随俞大纲夫妇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先送走了主人夫妇，然后一直陪伴姊弟情深的俞大维，直至她寂寞地离去。施妈一生对俞家赤胆忠心无私的奉献，启木感恩，先后多次去台湾探望这位无儿无女孤苦伶仃的老人，让她生活上可以安枕无忧地度过余年。

我们见面当然首先谈母亲。启木美丽高雅的母亲俞邓敬行，在先生去世后搬到女儿俞启玲新泽西家中居住，我去看望俞伯母时，她对丈夫的故去只字未提，好像当他远行去了，但她落寞寡欢的神情刻写出心中的哀思和苦闷。1984年秋天她也随夫远行去了。

谈到我的母亲，我告诉启木：“母亲江巫惠淑如今健在纽约，今年高寿整整一百，知道我跟你续上了旧缘喜出望外，我和你见面的一点一滴细节她都想知道。她跟你父母在台北见过几次，也感念这些年来俞家对我的关爱，你父亲在我的信中也赞赏我母亲是位了不起的伟大女性……”

无所不谈忆起1970年我离婚，轰动新闻搞得满城风雨，除了父母几乎能躲的人都躲了，此时可信赖、可依托的还是俞家。除了俞伯伯关怀备至的劝导，此时俞伯母、傅妈妈、周曼华、胡蝶阿姨，都对我爱莫能助，她们几乎每天陪着我，在方城之战中麻痹自己，打台币两百元的逛花园。“战场”多半设在俞大纲夫妇台北金山南路家中，施妈似乎知道我大不幸的遭遇，处心积虑地做可口的饭食要给我增加体重，而且要我放心，我们在方桌上谈天，她要对外守口如瓶。傅妈妈知道我想远走高飞“逃”去美国，还贴心周到地联络了她的干女儿，必要时可以照顾我。俞大维先生出面向台湾警备司令部担保“无共党匪谍嫌疑”，我才得以从曾经是最亲近的人的诬告中脱险，顺利拿到出境签证离开台湾。记得当年俞大维先生还不失幽默地安慰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与启木相识于1966年，她在美国念大学，暑期回台北探亲时在她父母家中见到。她长我四岁，十分阳光、率性。我早就从她父母那里知道她幸运的奇遇：年轻时在父亲朋友的旅行社打工，一次在导游时认识了一位美国夫妇，十分喜欢她，结果这对夫妇，不但遵守承诺把她接到美国供她念书生活，还视如己出认她作了养女。启木告诉我父母是亿万富翁，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每年陪伴他们搭乘邮轮周游列国数周。此后再到启木已经是1970年，我在洛杉矶找工作无路时她帮我搬了一次家，后来我先搬去伯克利后又迁到纽约就去了联系。

直至2021年，1987年在纽约大都会工作时就认识的女高音玉屏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急切地在找你，是我朋友的朋友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原来启木在遛狗Angie时见到一位散养的东方人Mary，攀谈中知道她喜欢看歌剧，就开始打听我，Mary在看歌剧时遇到过我和邓玉屏在一起，于是就接上了线。

启木告诉我她在香港给美国银行工作多年，退休时已经是单身，搬到新泽西之后，才把兴趣放在访祖寻根和养狗上。父母在世时家人对大家这类事极少提及，而俞家都轮流悬挂曾国藩的书法，上联：世事多忙忙里错，下联：好人半自苦中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启木摸透了大概，先后去了长沙寻找曾国藩（曾文正公）的来龙去脉，赴浙江找寻俞家的家史。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启木的显赫家世：父亲俞大纲是中国戏曲学家，父亲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父亲的长兄俞大维曾任民国交通部长，到台湾后又是军界要员，大儿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父亲的姊夫傅斯年是望重一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台大校长；父亲的亲表兄则是亦师亦友，两代姻亲三代世交的大儒陈寅恪……沾亲带故的名人不胜枚举。

她给我看了一篇吕山写的文章《梁声灯影，遥想当年》，兹录其中一段：

客人是中国台湾地区已故著名戏剧学家俞大纲的女儿，这一次专程来看俞家祖上的发祥地，顺便作观光之游。我陪她从宝积寺下进入街口，由东街路上洞桥（其实也是平板梁式桥，不知何故称作洞桥），望着桥下一泓算不上清澈的水，我忽然心怀不安，直怕有污浊的清目。然而俞启木似乎未注意及此，她久久地朝着东西两头眺望，动情地喊了起来，“啊！一条小河！”我指着告诉她，前面一个河滩就是俞家的。她显得兴奋而急切，追着我问哪里哪里？似乎想把这

里的风景风情，都印到她的脑海之中。

我马上将我写的《故人事》一书送给启木，其中一章“感怀良师益友俞大纲教授”是2011年秋天写的。

1989年，在阔别台湾十九年后我又回到了台北，在“国家剧院”作独舞演出。当时，最令我遗憾的是：无法邀请俞大纲老师坐在观众席上。他是我舞蹈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知己，我甚至想，哪怕只有他一位观众在场，于我，此愿已足矣！我一直十分懊悔，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前去探望这位慈祥和蔼的良师益友，并向他展示自己离开电影圈后，在舞蹈艺术上的成长，听他指点，向他讨教。1977年5月2日他因心脏病发，走得如此突然，匆忙！

1963年，我十七岁，演完香港国联公司的创业作，李翰祥先生执导的黄梅调影片《七仙女》，没多久就结识了俞大纲先生。因为我在影片中既是主演又任编导，一生专注于中国传统戏曲和诗词研究，俞大纲教授，很想了解我在中国大陆接受艺术教育的经验。

在他金山街的家中，在馆前路他挂名董事长的“怡太旅行社”文艺沙龙中，我先后结识了戏剧家姚一苇教授和刚刚出道的胡耀恒、陈耀圻，以及戏曲界的徐露、郭小庄，国外来访的舞蹈家黄忠良、王仁璐等人。我虽然那时在当电影明星，但对自己的老本行舞蹈还是念念不忘，在俞大纲老师的召集和推动下，当时在他周围的几位音乐、舞蹈界朋友，刘凤学、许常惠、史惟亮和我，一起成立了“音乐、舞蹈研究小组”。在俞老师主持的会议上，同行们聚在一起交换经验，总是气氛热烈，畅所欲言。谈得多了，结果我舞兴大作，感到当时台湾的中国舞蹈仍是一片沙漠，自告奋勇地在俞老师推荐下，由中国文化学院舞蹈系教授中国舞。由于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对大陆一切甚为敏感，我怕惹上“为匪宣传”的嫌疑，不敢暴露我在北京舞蹈学校习舞的背景；加上当时拍片日程太紧，要保证每周上两节课，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坚持了一个学期，只好不遗憾地作罢。

往事依稀，俞大纲老师的博学谦恭，真诚无私，对于艺术的认知和发掘、努力和尽心，为台湾的文化加油添柴，直到今日都还在台湾艺文界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文门舞集林怀民就曾对我说：“是俞大纲老师带我认识了中国文化的。”

那时，国联公司一口气买下了琼瑶四部作品的版权，准备摄制。其中同名电影《几度夕阳红》及《回旋》改编成电影《窗里窗外》由我主演。在这之前就在俞老师家中见过琼瑶几次，俞老师很珍惜她一个人艰难地带着孩子还发奋图强，坚持创作，也欣赏她过人的毅力和善良的本性，所以特意安排我们结识，希望我们的交往。接触下来，我感到琼瑶姐在作品上“文如其人”，在生活中“见义勇为”，是位具有真性情、待人接物极其真诚的人，交友贵“真”，除此之外，反复何求？至今，我们虽远隔重洋，但一见面便可以促膝谈心”。

俞大纲老师作为年轻人的精神导师，力行身教和言教，他极有亲和力，常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在闲聊谈话中谈文论艺，也在生活中教导做人处事的道理。

1966年，正值影剧事业高峰，我突然闪电结婚，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诸多长辈和同行不便或并不看好，大都没来参加在国宾馆饭店办的喜宴，而长辈俞大纲、邓敬行伉俪却充当我的家长，给了我得以依靠的臂膀。

1970年离婚后初到美国，人事两茫茫，思念仍在台的幼子，过去如影随形。学英文之余，除了给亲友写信，其他的事都无法专心，其中跟俞大纲老师通信最多。他写道：“从信中接触到你的愤恨，为之惻然，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忘了一切吧！宗教与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舍而非取，我希望你能走上这一境界。常作如是想，至平心境可得平安。”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认识到：一个人面对现实，求生存的勇气和忍受寂寞的耐力，都是在不断的磨砺中增长锻炼的。于是决心把自己钉牢在桌前写舞蹈，让自己只回忆和那份“伤痛”完全无关的事，把时间和脑子都填满。我写信告诉了俞老师这个决心，他马上回信鼓励：“好在你已经想通了，努力读书和写作，可以暂解忧思，充实自己。”整整四十年后的今日，重新审视，再次体会到这位浸淫在古典戏曲和诗词世界里的学者，是如何保持一颗关爱且宽广的心灵。当年我少不更事，哪能了解他所指境界呢？在我人生陷入低谷时，俞老师才一步步地把我领出了当年无边的苦海。

离开台湾半年后，俞老师来信告诉我：“感谢你写的事件，我编写了《王魁负桂英》京剧剧本，由郭小庄饰演桂英，演出时得到巨大的回响。”

俞大纲老师在台湾文艺史上对京剧文化的推展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他去世后，郭小庄感到俞老师对京剧及对她的栽培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就是希望她能为京剧走出一条新路。为了承继俞老师的遗志，一年后她成立了“雅音小集”，选了《王魁负桂英》作为剧团作品。

由于传统京剧盛况不再，观众逐渐流失，俞老师大力推广京剧，除了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他用通俗的妙笔写出古典的戏剧。姚一苇教授认为：在台湾，俞大纲教授是一位真正懂得戏剧的人。在戏剧结构上，绝无废笔，他的剧本，既深具古典特色，又能避免部分传统戏曲拖泥带水的缺陷。

1981年，我回北京舞蹈学院给大专班教现代舞创作，其中涉及：舞蹈的语汇要从自己文化的根底和规律出发，强调中国民族舞蹈必须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观点。结果老师给我出难题：要选一个最传统的中国故事，编一个新的现代作品来说明我的创作概念。在苦思题材时，想到俞大纲老师经常跟我强调：要进得了传统又走得出来，以及他当年因我的婚姻有感而发编写的《王魁负桂英》。最后，我运用了抽象的方法来演绎，探索人性中的野心、情爱与矛盾、良心愧疚等问题，并按照思路给这个舞剧起名《负、复、缚》，请谭盾作曲。舞剧可以说是在台湾艺文界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也是变奏、另一种诠释或创作上的延续，这些都是这位良师当年苦心婆心循循善诱我们这群年轻人要走的道路，希望我们走上自己的道路。

虽然俞老师不能坐在观众席上，但我始终相信他在微笑慈祥地看着我，他的言行仍然在教诲引导着我和许许多多的人。

请欣赏俞大纲老师在《王魁负桂英》剧中一段感人肺腑的桂英唱词：  
一抹春风百劫身，菱花空对海扬尘。

纵然埋骨成灰烬，难道人间未了情。

启木十分疼爱她的小狗Angie，带Angie来纽约看我极不方便，上周秋高气爽，于是我到新泽西启木家探望她。傍河而立风景绝佳的宽大客厅中挂着一幅张大千画作，早闻大千先生与俞家很熟，但有趣的是这张画竟然与俞大纲先生有感于我的事件创作的国剧《王魁负桂英》有关。画上有大千先生题字，右题：新声别慕焚香记，误笔翻成归妹图。敢乞岁朝蓝尾酒，待充午日赤灵符。六十四年嘉平月，大千居士爰。

题下：  
两年前得见  
大纲先生为小庄小友  
改编元人焚香记  
上演台北幽抑宛转不去于心  
每思作数笔画以报先生之雅  
而表病缠身腕手颤掣未由呈正  
顷者小廖努力归国  
追忆当时情境  
仿佛若有所遇  
率尔成此乃为家人所笑  
此终南归妹图耳  
与台上未为吻合  
予亦哑然  
但此时恰逢岁除  
君意亦复大佳  
唐宋以来曾于岁朝图画钟馗  
祓除不祥  
降至天明  
始于午日悬挂耳  
大纲吾兄方家晒正  
大千弟张爰  
俞大纲先生知大千先生美意，特和诗一首作为回报。在大学时俞大纲先生曾随徐志摩习新诗，此画触动了他的诗兴，特写了这首七言诗志谢：  
四海群推须绝伦，自管即壁自藏身。  
胸中意气招猿鹤，臂展霞光动鬼神。  
道子声华溢诧藻，忆翁孤愤托兰薪。  
断肠结想临川梦，敢为宣纸乞写真。  
启木告诉我，疫情好转后，将有台北之行，届时会将此有纪念意义的画作捐赠给“俞大维先生纪念学会”与大众分享。

今年10月25日林怀民如约而至我纽约家中，他送给我新出版的书《激流与倒影》，扉页上他写：“最后一本小书江青来消遣。”我说：“怎敢当，我们共同的恩师是俞大纲老师。”怀民离开后，我迫不及待拜读书中的文章，首先读《馆藏四十号——想念俞大纲老师》。读时禁不住百感交集，时光倒流，往事历历在目，激起我对此生有知遇之恩的俞伯伯无限的哀思、崇敬与感激，同时也缅怀体贴入微的俞伯母、傅妈妈、俞大维先生，你们的言行、音容慈慈，你们的善良、仁厚、正义，永远在引领着我前行！

2022年11月10日于纽约



俞氏三兄妹1950年代的合影，大哥俞大维（右）和俞大维、俞大纲。墙上是俞大维先夫台大校长傅斯年画像。

「文汇报」  
「文汇报」  
笔会  
微信公众号  
QR code